

# 同盟视野探析

张景全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同盟视野是指缔结同盟的国家通过同盟所要追求的以安全、军事为主的关切范围,它主要通过同盟条约中的同盟覆盖区域的形式体现。关切主要是一种基于利益之上的主观判断,覆盖区域主要是基于利益之上对地理空间范围的主观判断,因此,同盟视野既具有客观的地理性,又具有主观的判断性。同盟视野不同于同盟目标和同盟针对对象。同盟视野概念的提出有利于理解同盟这一概念,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构建和丰富同盟理论。同盟视野是同盟得以存在的实质性内涵和逻辑支撑之一。同盟视野重合程度高,则同盟持续的时间长,运行更有效;反之,则同盟持续的时间短,运行效率低。同盟视野的类型分为地区性与全球性、静态性与动态性,同盟类型的不同及其转化对同盟存续意义重大。

**[关键词]** 同盟视野;地区性;全球性;静态性;动态性;同盟存续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2009)01-0028-(08)

**[收稿日期]** 2008-08-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05JJDGJW006)  
获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东北亚研究与东北振兴创新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 张景全(1971-),男,吉林九台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同盟一直是国际关系实践的重要现象之一,它也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在安全事务领域中,合作的核心模式是国际同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s)。对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而言,同盟是国际政治的主质:它们事关全球政治结构并维持均势”。<sup>[1]</sup>“尽管一些政治学家们发出警告,但是国家领导人仍继续构建或求助于军事同盟,一些领导人把同盟看做是自己安全政策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sup>[2]</sup>因此,同盟理论的构建在同盟实践的推动下得以发展。笔者不揣浅薄,试图在前辈同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盟视野”(the view of alliance)概念,以求对同盟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 一、同盟视野的概念及其意义

所谓的同盟视野,是指缔结同盟的国家通过同盟所要追求的以安全、军事为主的关切范围,它主要通过同盟条约中的同盟覆盖区域的形式体现。由于同盟视野涉及利益关切及覆盖区域,关切主要是一种基于利益之上的主观判断,覆盖区域主要是基于利益之上对地理空间范围的主观判断,因此,同盟视野既具有客观的地理性,又具有主观的判断性,同时,它又被深深打上了军事、安全利益的印记。

同盟视野不同于同盟目标,也不同于同盟针对对象。同盟视野强调的是基于安全和军事利益

之上对地理空间范围的界定,同盟目标强调的是基于安全和军事利益之上对地理空间范围所要达到的状态的界定,同盟针对对象强调的是基于安全和军事利益之上对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具体敌对国家的界定。同盟视野概念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同盟视野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同盟这一概念,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构建同盟理论。一般而言,只有先理解同盟概念,才能理解同盟视野概念。然而众所周知,学者们对同盟概念的理解一直存在宽泛和严格两种。较为宽泛的同盟界定认为,它是“主权国家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通常是为了相互保障自身的安全”;<sup>[3]</sup>“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sup>[4]</sup>“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sup>[5]</sup>较为严格的同盟界定认为,同盟是“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的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明确地确认”;<sup>[6]</sup>“联盟是国家感到有共同的敌人或者共同的安全问题而进行的正式合作,这种合作一般是在特定的有限的时期以内”。<sup>[7]</sup>笔者认为,同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共同的安全利益,针对一定时期、针对一定区域、针对一定对象承诺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sup>[8]</sup>

较为宽泛的同盟界定,我们可以认为是广义的同盟概念;较为严格的同盟界定,我们可以认为是狭义的同盟概念。广义同盟概念的界定,好处是把历史与现实中大量符合概念的现象纳入到研究之中,坏处是存在同盟泛化之嫌,并由此可能对同盟理论进一步构建的基础产生影响。狭义同盟概念的界定,好处是使同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建立在相对严谨、坚实的基础上,坏处是在分析该问题时有可能错过许多丰富多彩的同盟个案。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领域的同盟问题,应该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定,以利于同盟理论的进一步构建。正是基于相对狭义的同盟概念界定,笔者才提出了同盟视野这一概念。

另外,我们明确提出同盟视野概念,可以理清它与同盟目标、同盟针对对象的区分,这无疑利于丰富同盟概念的内涵。

其次,同盟视野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同盟这种国际关系实践。具体而言,同盟视野对于同盟存在及同盟生命力具有一定的意义。

同盟视野对于同盟存在的意义。一方面,同盟视野有益于丰富同盟存在的实质性内涵并为之进一步提供逻辑支撑。同盟的实质性内涵一般包括同盟针对的对象、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承诺。如果同盟的实质性内涵仅仅包括这两个方面,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缺少一个逻辑上的链条,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是基于怎样的条件针对一定的对象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没有一定的条件,同盟的存在还有多少意义呢?一些同盟理论作出了如下解释:把同盟签字国是否和遭到何种攻击作为条件,即把同盟的安全关切范围仅仅局限在了同盟签字国。一方面,一些同盟条约的文本对安全关切范围的强调已经超出了签字国本身,我们将在下文关于英日、俄日、德日同盟的同盟视野的表述中看到这一点。同时,同盟往往向其对手明确表明哪些是其利益攸关的区域,并且对其利益攸关区域构成威胁的对手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既可以阻止其他国家染指,防止其他国家误判,又可以凝聚同盟成员国实现安全关切的力量和意志。在同盟实践中,存在由于没有对同盟视野进行清晰而明确地界定而导致已经建立的同盟出现弱化或最终崩溃的个案。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对抗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威胁,由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组建起“小协约同盟”(Little Entente)。尽管同盟成员国详细设计了同盟条约,以确定在何种条件下援助或不援助盟国。然而,后来的历史还是证明“小协约同盟”是虚弱不堪的。这固然存在该同盟力量有限的原因,但是,由于德国和俄国在同盟建立时被视为所有签字国理所当然的最大威胁国家,同盟条约规定只有在匈牙利或保加利亚进行威胁时成员之间才进行援助,德国和俄国却被排除在条约中所涉及的事项之外。<sup>[2]</sup>最终,“小协约同盟”在德国对其同盟视野内国家进行大肆蚕食中

瓦解。此外,同盟影响国际秩序的传统功能追求以及区域化大行其道的现实,<sup>[9]</sup>势必要求构建同盟的国家把基于何种主观判断的何种具体空间范围作为展开军事行动的条件纳入其中。因此,同盟视野这一概念是进一步支撑同盟存在的逻辑链条,它丰富了同盟的实质性内涵。

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存在大量国家间军事、安全等利益关切交叉的现象,然而,这种利益交叉并没有自然导致同盟的建立。尽管原因复杂,但是,存在军事、安全利益交叉的国家并没有能够就较为明确的利益关切范围达成共识或做出事先约定,可谓难脱其咎。例如,1900年10月,英德协定签订。英德的政治家大谈两国是“天然的盟友”,<sup>[10]</sup>在欧洲两国的利益存在交叉。但是,英德就同盟的其他适用范围产生严重分歧:英国认为同盟应该把中国东北包括在内,而德国认为同盟的适用范围不包括中国东北,因为德国鼓励俄国在东北亚的冒险,以此转移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并降低俄法同盟的威力。日本也试图加入其中,构建所谓的日、英、德三国同盟。日本认为同盟适用范围应包括中国东北。1901年3月,日本的建议被德国拒绝。但是,日本的结盟政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同月,日本驻英国公使林董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详细的同盟条约,在同盟建议案中,德国仍包括其中。<sup>[11]</sup>最终,由于英、德、日就同盟视野并未达成共识,三国同盟无果而终。然而,由于英日存在交叉的同盟视野,两者对此做出了明确的约定,英日同盟最终得以建立。

同盟视野对于同盟生命力的意义。同盟建立之后能存续多久,同样涉及多种原因,但同盟视野的作用不可小视。同盟视野重合程度高,则同盟持续的时间长,运行更有效;反之,则同盟持续的时间短,运行效率低。日英同盟与俄法同盟便是一对有趣的例子。

20世纪初,东北亚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中。在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记忆与对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的现实觊觎的刺激下,英日同盟中的日本与俄法同盟中的俄国均进一步显露锋芒,积极备战。就在英日同盟建立后不久,1902年3月,俄法同盟发表声明:“如其他列强的侵略行动或中国国

内再度发生动乱”,对“两盟国政府的利益”构成“威胁”时,“它们将就保卫此等利益的手段进行磋商”。<sup>[12]</sup>分别获得日英同盟与俄法同盟支撑的日俄最终兵戎相见。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日俄两国的盟国与日俄的结盟视野存在差距如何影响了战争的进程。法国事实上是被盟友俄国拖进东北亚危机之中的,因为法国本来希望俄法同盟主要针对欧洲的德国,即法国的结盟视野集中于欧洲。日俄战争使法英爆发战争的危险增强,这显然对法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它将受到英国和德国的夹击。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法国做出了决定性的调整。1904年4月,当它的盟友俄国在东北亚与日本苦战之时,法英缔结了和解的协约。5月,法国为战争中的盟友尽了最后一次义务:向俄国提供了一笔贷款。而日本的盟国英国与日本的结盟视野重合程度相对较高——尤其是在中国,日本与英国都要抵制俄国在中国的扩张。因此,英国在向日本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还给予日本以军事帮助。例如,俄国的太平洋舰队逐步被击溃后,本想调黑海舰队驰援东北亚。但英国却让奥斯曼土耳其封锁黑海海峡,俄国不得不从更遥远的欧洲调遣波罗的海舰队。因此,俄国对俄法同盟充满失望。“当俄国遇到战争时,它既没有一个能从形式上保障另一大国直接的军事援助的同盟,也没有可以实际上保证财政援助的同盟”。<sup>[13]</sup>与此相反,日本对利用日英同盟的意义存在认同。随后日本与英国缔结了第二次、第三次日英同盟。可见,结盟视野的重合程度对同盟的生命力影响之大。

## 二、同盟视野的类型一:地区性与全球性

同盟视野对于同盟的建立与同盟建立后的生命力意义重大,那么,同盟视野是否存在不同的类型?它对同盟的建立及其生命力又存在哪些影响呢?笔者认为,同盟视野存在两种类型:地区性与全球性,静态性和动态性。

地区性同盟视野,指的是同盟参与国以军事、安全为主的关切集中于某特定的地区。全球性同盟视野,指的是同盟参与国以军事、安全为主的关

切不仅仅局限于某特定地区,而是涵盖了全球其他的地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性同盟视野并非指的是涵盖全球任何地区,只要同盟参与国的利益关切范围涵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洲际区域,那么,我们便认为这种同盟视野的类型就是全球性的。我们将以英日、俄日、德日同盟为例,对同盟视野的地区性与全球性进行案例性诠释。

英国、俄国、德国都是 20 世纪某个特定时期的全球性强国,它们与日本结盟的同盟视野都是其更广泛视野的一部分。与之相比较,日本的同盟视野却是地区性的,具体表现在:日本在涉及同盟所覆盖区域时,多与同盟国就此问题展开争论,它更倾向于把同盟覆盖的区域限定在有利于自己的特定范围之内。<sup>[14]</sup>

英国与日本结盟的目标主要是为了维护其全球利益,在欧亚大陆对抗俄国、尤其是平衡俄国在远东的优势,缓解远东的压力,使它能够“集中自己的军事资源以便加强英国的全球利益”。<sup>[10] (161)</sup>因此,其同盟视野是全球性的。经历了日英同盟建立、先后出任英国财政大臣和首相的贝尔福便认为:日本将可能使英国陷入对日本生死攸关而对英国无关紧要的对俄法的战争,因为,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关键性的”。他进一步举例说:“日本当然不能帮助我们阻止阿姆斯特丹落入法国之手,或者阻止荷兰落入德国之手”。<sup>[15]</sup>贝尔福的评价充分说明了日本与英国同盟视野的不同:日本的同盟视野集中于东亚,而英国的同盟视野远比日本的更为广泛。鉴于日本在结盟实践中成功地把自已的同盟视野集中于对日本利益相关的特定范围,一直力主日英结盟的外相加藤高明曾发表文章表示:日英同盟“限定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和朝鲜,这样日本就不会被拖进英国的帝国开拓之中”。<sup>[16]</sup>第二次日英同盟时,日本就是否把同盟覆盖的区域由东亚扩展至同盟国关切的印度与英国一度争执。一战时,日本援引同盟条约积极参加亚太战事,却一度拒绝派兵赴欧洲战场。

俄国与日本结盟的主要考虑是,既为了在对抗德国中弥补自己在欧洲的劣势,又为了平衡美国在远东的优势,便于对中国的侵略,因而,俄国

的同盟视野是全球性的。两届俄国外交大臣均表达了俄国对日本结盟以求同时谋求俄国在欧洲和亚洲获得稳定与收益的同盟目标。外交大臣沙佐诺夫在日俄战争失败后提出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甚至同盟关系以保证欧洲的安全,“俄国的注意力大概要长期集中于它在欧洲的利益上。为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在远东得到安全,而这种安全最好由与日本的友好关系甚至同盟关系来予以保证”。<sup>[17]</sup>曾任俄国外务大臣的伊兹沃尔斯基也认为:“俄国将来的长远之计在于:一方面加强同日本的友好;另一方面同英国达成圆满的和解,以此维护世界和平,专心致力于国力的恢复,把帝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转移到其本土的欧洲”。<sup>[18]</sup>对于日俄同盟,日本的同盟视野仍集中于东亚,具体说就是中国。1907年 1月,山县有朋在写给时任首相的西园寺公望的信中说:应该“仔细而慎重地考虑中国”,与俄国就中国“满洲”“交换意见”,以最终同彼得堡“结盟”,这样“不仅便于我们控制满洲,而且作为一个有利的联合手段,还可以阻止西方强国在亚洲的入侵”。1912年 7月,首相桂太郎曾在彼得堡对俄国的大臣表示:“日本和俄国有能力(针对中国的混乱)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强化俄日间的密切关系”。<sup>[19]</sup>1916年,使双方发展为同盟关系的第四次日俄密约中明白无误地指出了盟约具体的适用范围——中国:“缔约双方承认,保卫中国使之不受不论哪个对俄国或日本抱有敌意的第三国的政治上控制,是它们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在”。<sup>[20]</sup>

德国同日本结盟是为了实现与英、法、苏、美全球对抗,谋求日本在远东配合的同盟目标,因而,德国的同盟视野也是全球性的。有德国学者指出:“与希特勒长期、广泛和着眼全球政治的战争目标相反,东京领导集团仅致力于有限的战争目标,并在时间有限的消耗战后通过议和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亚洲为日本争得并保持地区霸权地位,同时清除所谓‘白人列强’以往的影响”。<sup>[21]</sup>由于日本与盟友德国结盟视野存在差距,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与德国在二战中一直对两国的进攻方向存在争执,它集中体现在日德对苏作战问题上的不协调。1941

年 3 月,松冈洋右与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会谈,里宾特洛甫向松冈明确表示:“对苏纷争无论如何是可能发生的”,松冈明白他的盟友在向日本暗示:一旦德国进攻苏联,日本应从东方夹攻苏联。于是松冈答复道:“日本始终是忠实的全盟国,对于共同的努力不只是以敷衍而将贡献出全力”。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7 月 10 日,里宾特洛甫在致德国驻东京大使的电报中说:“您应根据我给松冈的传言,使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因为参战的实现是愈早愈好。和过去一样,必须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线路为当然的目标。随同苏联的崩溃,三国同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巨大无比,那么英国的崩溃问题,即完全消灭英伦三岛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sup>[22]</sup>然而,7 月 27 日,在日本大本营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却做出如下安排:“首先,……贯彻执行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各项措施,借以加强向南方扩展的态势。帝国为达此目的,不惜对英美一战”。“对于德苏战争,以三国轴心的精神为基础,但暂不介入,秘密作好对苏作战准备,独立自主地加以处理”。<sup>[23]</sup>8 月 29 日,日本政府决定:“无论德苏战争如何演变,打消在昭和十六年(1941 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专心致力于南方”。<sup>[24]</sup>1942 年 5 月 15 日,里宾特洛甫在发往东京的电报中进一步表示希望“日本尽早作进攻海参崴的决定”。1943 年 3 月 6 日,大岛浩对里宾特洛甫说:“德国政府所提出的攻苏建议,已列为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络会议的问题。在联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会详加讨论和彻底检讨。其结果如下”,“日本政府充分认识来自苏联的危险,并且日本也完全了解盟邦德国希望日本对苏作战的愿望。但是有鉴于日本目前的战局,日本不能够参战。且毋宁认为现在不对苏开战反于双方有利。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是决不会轻视对苏问题的”。<sup>[22]</sup>可见,日本与德国之间同盟视野的地区性与全球性差异,也是日德迟迟未能有效协同作战的原因之一,它对日德同盟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以往对同盟非对称性的分析集中于同盟国之间在收益、实力、防务、结构等方面。例如,

迈克尔·阿特菲尔德(Michael F. A lfeH)和詹姆斯·莫洛(James D. Morrow)认为,大多数同盟并非由大国构成,而是非对称的,这些同盟是由一个大国和一个或几个小国联合而成。大国通过同盟获得的收益是在外交政策上具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小国通过同盟获得的收益是安全保护。小国提供的持续安全对一个大国的安全似乎并不具有实质性的益处,同盟必须为不同成员提供不同的利益。<sup>[25]</sup>上述讨论表明,存在着地区性同盟视野与全球性同盟视野,它们也是非对称性的。这为我们进一步审视和分析同盟非对称性命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结论。如果具有不同同盟视野的国家能够在全球性和地区性范围内有效地满足彼此的外交自由需求,那么这对同盟的运行和持续将是积极的,否则将是消极的。如果具有全球性同盟视野的国家与具有地区性同盟视野的国家能够有效地满足彼此的安全需求,例如,具有全球性同盟视野的国家为后者提供持续而充分的安全保障,并且这种安全保障符合后者地区性同盟视野的实现;具有地区性同盟视野的国家为前者提供军事基地和地区性安保力量,并且这种安全保障能够对前者全球性同盟视野做出灵活反应,那么这对同盟的运行和持续将是积极的,否则将是消极的。因此,地区性同盟视野与全球性同盟视野也进一步展现和丰富了同盟的非对称性。

### 三、同盟视野的类型二:静态性和动态性

如果说地区性与全球性同盟视野让我们看到了同盟参与国同盟视野类型的不同对同盟实践的意义,那么,静态性与动态性同盟视野类型的划分,将为我们展示同盟参与国同盟视野类型的转化对同盟实践的意义。

所谓静态性同盟视野与动态性同盟视野,主要是根据同盟参与国的利益关切范围的变与不变来进行区分,因而这种区分也是相对的。一般而言,从长期来看,同盟参与国的利益关切范围往往是变动的,动态性同盟视野当属多数。然而,一方面,在特定时期内,同盟参与国的利益关切范围是固定的,因而特定时期的同盟视野往往是静态的;

另一方面,同盟生存的长短不同,生命力较短的同盟,其同盟参与国的利益关切范围在出现变动之前即已消失,因而其同盟视野往往也是静态的。

同盟视野的动态性与静态性深受结盟国家实力变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同盟是多个国家力量的汇聚(capability-aggregation)。<sup>[26]</sup>因此,国家实力(power)的变化会影响这种力量的汇聚。当一个国家的实力相对于自身、盟友及对手减弱时,它实现利益关切的能力就会减弱,这促使它强化或弱化实现利益关切的愿望。在此情况下之所以可能出现强化利益关切,主要是由于国家实力相对减弱会引起结盟国家在如何实现利益关切上进一步依赖于盟友;当一个国家的实力相对于自身、盟友及对手增强时,它实现利益关切的意愿和能力则会增强。这一切都将导致如下结果:结盟国家的利益关切区域发生变化。因此有学者指出:当国家实力发生大的变化时,无论是变得更加强大还是更加弱小,它们都不再愿意履行此前在不同情况下所承诺的同盟义务。<sup>[21]</sup>可见,国家实力的变化影响实现利益关切的能力与愿望,会对利益关切的范围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导致其利益关切范围的变与不变,即同盟视野的转型。

同盟参与国能否有效地处理静态同盟视野与动态同盟视野的转化,对同盟的存续、同盟的可靠性以及国际安全意义重大。首先,由于实现利益关切的愿望与能力的变化,导致利益交集的减少或增大,这会促使同盟参与国重新考量同盟存续的意义。利益交集增大,有时会导致同盟强化;有时也会导致同盟弱化,即当同盟成员行动的地理空间规模增大时,将导致同盟逐渐失去其严格性的特征,更多的国家和更大的地理覆盖意味着更多风险的承担,最终的结果是同盟成员国承诺提供军事援助的空间越来越远离它们的中心利益。<sup>[27]</sup>而利益交集减少,往往导致同盟弱化,甚至同盟瓦解。其次,由于利益关切范围的转化,会导致原来基于实现这种利益的同盟管理结构、同盟运行机制做出相应调整,从而促使同盟参与国之间同盟政策的调整,同盟国之间出现新的利益博弈。其三,同盟内国家与同盟外国家之间的利益也会出现新的互动,从而影响国际安全。当同

盟视野在静态性与动态性之间转换时,一方面,同盟参与国为了适应这种转换有可能变得或者看起来更加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同盟视野转换中的同盟所发出的信息往往是模糊的、不明确的,非同盟内国家会不得不做出新的判断:该同盟转化同盟视野意欲何为?该同盟的可靠性是否存在?该同盟更具有威胁性还是更具合作性?不同的答案会产生不同的针对该同盟的政策,这无疑都将导致国际安全态势出现波动。我们将以美日同盟为例对静态性同盟视野与动态性同盟视野的转化进行案例分析。

诚如前文所述,同盟视野存在地区性和全球性之分,自美日同盟建立至20世纪末,美国的同盟视野是全球性的,日本的同盟视野是地区性的。美国与日本结盟主要是为了实现对抗和遏制冷战时和冷战后欧亚大陆势力,防止其挑战美国霸权,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日本作为同盟参与国,在一定时期内其同盟视野是静态的,但从较长的时期内,其同盟视野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1)1952年,日美同盟条约生效,日美防卫的区域是日本本土及其附近。(2)1960年,修改后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美联合防卫的区域是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200海里范围内。(3)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日美联合防卫地区界定为“远东”。198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正式确定关岛以西、菲律宾以北1000海里的海上航线以及日本周围数百海里的区域为日本的防御范围。(4)1996年,日美同盟关系再次调整,规定美军对日“周边事态”采取军事行动时,日军可到公海提供后勤支援。日本政府声称:“日本周边地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将包括亚太甚至还可能包括印度洋、波斯湾地区”。<sup>[28]</sup>2001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开赴印度洋,对美军提供燃料补给。2003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开赴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

如果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仅会发现日本的同盟视野存在地区性同盟视野和全球性同盟视野,还会发现日本4个所谓静态性同盟视野及其转化,即日本本土·附近→日本本土·周边200海里→远东·1000海里→周边事态·印度洋、波斯湾地区,从1952年、1960年至1978年再至

1996年,日本的静态性同盟视野向动态性同盟视野的转化规律是约每隔 18年。在各个阶段,日美两个盟国自身的实力、相对于盟友的实力以及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都在发生着变化。

另外,日本的静态同盟视野向动态同盟视野转化时期,恰恰是美日同盟出现剧烈摩擦的时期。从 20世纪 60年代至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堪称日美摩擦时期,这里固然存在日美经济冲突的因素,但是,同盟视野的静态性与动态性类型及其转化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以兼具安全与经济意义的政府开发援助为例,日美在此时期争议不断。日本长期视政府开发援助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正如一位自民党人士在 1983年所说:“目前,日本的军事力量是有限的,但援助则是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视援助为防卫努力的替代”。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重视对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援助,而美国一直谋求使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全球化。1977年 12月,率先提出综合安保战略的野村综合研究所就认为:“欧共体诸国给非洲、中东各国许多援助,美国把援助集中在拉丁美洲。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当然不应限定在特定的地区,就历史上或地理上的关系乃至现在已经确立的关系而言,我国的援助相当地集中于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理所当然的”。里根入主白宫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有关日本外援的专门指南,认为日本应在保持对东南亚援助水平的同时,增加对其他地区的援助。后来,日美多次就此问题交锋。1983年 8月,在华盛顿召开日美援助协商会议,美方敦促日本增加对亚洲以外地区的援助,遭到日方抵制。1985年 3月,美国副国务卿阿马科斯特在东京与梁井外务审议官会谈,再次敦促日本对亚洲以外地区的关系作战略上的考虑。<sup>[29]</sup>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美国进一步呼吁,如果日本要获得全球经济影响力,那么日本就应该不仅在自身防务上而且应在维护全球秩序上分担责任。<sup>[30]</sup>2005年 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日本,提议日美进一步协调对外援助政策,建立日美战略开发同盟,以充分发挥同盟在反恐战争、推广民主以及遏制对手中的作用。

从同盟视野的角度来看,日本将其政府开发援助集中于东亚时期,可认为它的同盟视野是静态的,而美国要求其承担更广泛区域同盟义务时,即扩大其援助范围,日本同盟视野出现由静态性向动态性的转化。因而在此时期,美日同盟出现了“漂流”,美日双方都一度对同盟能否存续产生忧虑。但是,在 20世纪末至 21世纪初,由于日本同盟视野由静态性转化为动态性、由地区性转化为全球性,即日美的同盟视野得以逐渐协调,美日同盟的结构随之由不平等向相对平等转化,美日同盟得以存续并强化。而随着日本同盟视野由静态性向动态性转化,美日同盟视野所及的国家不得不重新调适与美日同盟的关系,这也引起了国际安全态势的震动。

总之,同盟视野概念的提出有利于进一步构建和丰富同盟理论。它是同盟得以存在的实质性内涵和逻辑支撑之一。同盟视野重合程度高,则同盟持续的时间越长,运行更有效;反之,则同盟持续的时间短,运行效率低。同盟视野的类型分为地区性与全球性、静态性与动态性,同盟类型的不同及其转化对同盟存续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Brian Lai Dan Reiter. Democracy,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 1816-1992[M].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pr., 2000, Vol. 44, No. 2: 204

[2]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 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2003, Vol. 57, No. 4: 802, 814, 817

[3] [美]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 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0

[4] A mold Wolfers. Alliances[C]. Edited by David L. Sil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268, 269

[5]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6]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 1990, Vol. 44, No. 1: 104

[7] [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 世界政治[M]. 王玉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83

[8] 张景全. 国际体系与日本对外结盟[J]. 日本学刊, 2005(3): 78

[9] 王胜今,于潇. 东北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FTA)的现状与趋势[J]. 东北亚论坛, 2007(4): 3-6. 陈志恒,李平.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关系的协调——兼论全球化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J]. 东北亚论坛, 2005(6): 18-21

- [ 10 ] [英] C. L. 莫瓦特.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2 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99: 732, 161
- [ 11 ] 英修道. 明治外交史 [M]. 东京: 至文堂, 1960: 160.
- [ 12 ] 崔丕. 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210.
- [ 13 ] [苏] 鲍里斯·罗曼诺夫. 俄国在满洲 (1892—1906) [M]. 陶文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399
- [ 14 ] 张景全. 20 世纪日本对外结盟初探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12): 15, 16
- [ 15 ] Keith Neilso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and British Strategic Foreign Policy, 1902—1914 [C]. Edited by Phillips Payson O'Brie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1922.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52, 56
- [ 16 ] Ian Nish. Origins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in The Shadow of The Dreifund [C]. Edited by Phillips Payson O'Brie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1922. 22
- [ 17 ] 余绳武. 沙俄侵华史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958
- [ 18 ] [苏] 罗曼诺夫. 帝俄侵略满洲史 [M]. 民耿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483.
- [ 19 ] Frederick R. Dickinson. Japan Debates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Second Revision of 1911 [C]. Edited by Phillips Payson O'Brie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1922. 105, 112
- [ 20 ] 日本外务省.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上册) [M]. 东京: 原书房, 1986: 420.
- [ 21 ] [德] 维尔纳·拉思. 德日两国在 1941—1943 年合作中的全球战略观点及其相互影响 [J]. 张茂林译. 军事历史研究, 1997, (4): 179.
- [ 22 ] [日] 远东军事法庭裁判所言语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书 [R]. 张效林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6: 395, 382, 384
- [ 23 ] 日本外务省.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下册) [M]. 东京: 原书房, 1984: 437
- [ 24 ] [日] 服部卓四郎. 大东亚战争全史 (第 1 册) [M]. 张玉祥, 赵宝匡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62
- [ 25 ] Michael W. Simon. Erik Gartzke. Political System Similarity and the Choice of Allies: Do Democracies Block Together or Do Opposites Attract? [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Dec., 1996, Vol 40, No 4: 618—619.
- [ 26 ] D. Scott Bennett. 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 1816—1984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Jul., 1997, Vol 41, No 3: 851
- [ 27 ] Robert J. Art. Creating a Disaster: NATO's Open Door Policy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Autumn 1998, Vol 113, No 3: 395
- [ 28 ] 谢朝晖. 战后日美军事同盟的历史考察 [J]. 军事历史研究, 2001, (3): 110
- [ 29 ] 冯昭奎, 刘世龙, 刘映春, 江培柱, 金熙德, 周永生. 战后日本外交 (1945—1995)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04, 205
- [ 30 ] Roger Buckley. US-Japan Alliance Diplomacy, 1945—1990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责任编辑 李英武]

## An Analysis on Alliance View

ZHANG Jing-quan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Academ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Alliance view is the limits that alliance actors pursue their security and military interests; it is embodied through alliance's covered region in alliance treaty. Favor is a kind of subjective judgment based on interest, and covered area is a kind of subjective judgment toward geographic area based on interest; therefore, alliance view has the character of objective geography and subjective judgment. Alliance view is different from the alliance goal and against subject of alliance. The concept of alliance view is useful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alliance, to construct and enrich the alliance theory. Alliance view is one of substantive connotation and logical support for the existing of alliance. The more degree of alliance view superposition, the more time at alliance existing and more efficient alliance running. Alliance view has regional and global type and static and dynamic type; the difference and transform of alliance view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existing and development of alliance.

**Key Words** Alliance view; Regional type; Global type; Static type; Dynamic type; Alliance existing and development